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

及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SONGMING LIXUE ZAI GUANGXI DE CHUANBO
JIQI DUI SHAOSHUMINZU WENHUA DE YINGXIANG

孙先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 及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SONGMING LIXUE ZAI GUANGXI DE CHUANBO
JIQI DUI SHAOSHUMINZU WENHUA DE YINGXIANG

孙先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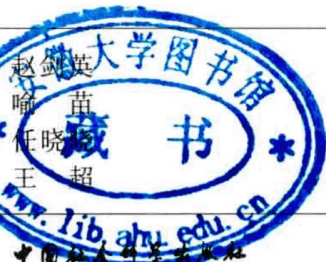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及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 孙先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445 - 8

I. ①宋… II. ①孙… III. ①理学—影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广西—宋代
②理学—影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广西—明代 IV. ①B244. 05②B248. 05
③K280.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69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任晓霞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503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得

广西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建设项目

广西大学 211 工程四期建设经费资助

绪 论

一 研究缘起和选题的意义

古广西号称百越之地，山高入少，居民分散，生活着壮、瑶、侗、苗、仡佬、毛南等少数民族。历史上民族问题曾一度尖锐，文化冲突较为激烈，针对此问题，早在先秦，统治者就开始对该地区构建儒家文化秩序，借以消除文化冲突。大量的资料表明，广西地区大规模的文化开发始于南宋，发展于明清。也就是说，古广西的文化开发、发展、成长是在宋明理学的全程参与下进行的。

理学与广西渊源甚深。宋理学初祖周敦颐之父曾为官贺州，程颢、程颐在皇祐间从父宦读书于平南畅岩，其后张栻、王守仁、李绂、唐鉴等理学大师纷纷入桂，对理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正如汪森在《粤俗》中所说：

广西风俗，自唐宋时颇多不美。如民之贫者，归罪坟墓不吉，掘棺栖寄他处，名曰“出祖”。生子不举，溺之于水，名曰“淹儿”。临丧破家供佛，盛饌待客，名曰“斋筵”。病不延医，杀牛赛鬼，名曰“毛药”。民多出外，他人掠卖其妻，名曰“卷伴”。^①

夷僚错居，古为藩服，文物普遍，今类中州。盖由张栻、吕祖谦之道化被于桂；范祖禹、邹浩之正气行乎昭。^②

张栻、吕祖谦之道化被于桂，范祖禹、邹浩之正气行乎昭，柳

① 汪森编，黄振中等校注：《粤西丛载》卷17“粤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03页。

② 同上。

宗元之文着乎柳，冯京、黄庭坚之德动乎宜，二陈、三士之经启乎梧，谷永之恩信、陆绩之儒播乎浔，马援之约束播乎邕，斯焉良然。^①

以上资料表明，宋明理学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伦理性、宗族意识、乡村控制和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影响甚大。因此，对理学在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分析，可以更为深入和具体地探讨广西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品质及其特殊性，对当今社会民族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提供借鉴价值。

对传统儒学在广西文化思想建设上的作用和意义的研究，目前已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有何成轩的《儒学南传史》和韦玖灵的《儒学南传与壮族思想发展》两部论著。《儒学南传史》以儒学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历史及其对壮族社会的影响作用作为考察对象，从哲学的视野，探讨了儒学地方化演变史，这对于全面、正确评价儒学大有裨益。《儒学南传与壮族思想发展》一书从哲学层面分析了儒学对壮族思想的萌芽、发展、成长的影响和意义。相关主题的论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表了几十篇，它们分别从历史学、传播学、文化学和哲学的视野探讨了儒学与广西文化的关系、儒学在广西地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广西多民族格局发展轨迹等。其中何成轩的《儒学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一文，从历史和哲学层面，论述了儒学在壮族地区传播的历史过程、传播途径、方式、特点及儒学对壮族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宋明理学在该地区的传播及影响研究不够系统，因此以宋元明清时期广西的理学为考察对象，以其传播和影响为着力点，可以展现宋明理学在广西文化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二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1.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和接受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随着宋王朝南迁，通过学校、科举等途径，用讲学、仪式等方式而逐步传播到桂北、桂东南、桂西南和桂西地区。传播

^① 汪森编，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主体是张栻、詹体仁、廖德明、王阳明、李绂、唐鉴等有理学背景的官员。

2. 宋明理学在广西传播的性质及其接受特点

在宋元明清时期,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和广西的地域特点,决定了其传播的权威性、主动性、单向性、滞后性等性质。因而,理学在广西的传播,在接受人群、时间、地域和民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接受人群看,理学的接受者主要是士人,从士人求学的目的、文化素质、身份地位等又可分为求学的士子、官员和土司子弟等。就时间而言,理学传播在宋为发生期,元为停滞期,明为成长期,清为成果期。就地域而言,呈现出桂北—桂东南—桂西南—桂西这样一个传播路线。就民族而言,壮族受理学影响最深,受众最多,接受时间也较早,至于宋明理学在其他民族的传播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广西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石安民、蒋元夫、蒋公顺、滕处厚、文元、陶崇、韦旻、覃昌等理学之士。在元代,可靠的只有唐朝一位。明代有30多位,有的还位居高官,如蒋冕、吕调阳等。清代广西的理学成果丰硕,受众多、影响大,而以陈宏谋为代表的“临桂学派”和以吕璜、朱琦等为代表的“岭西五大家”,还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广西的理学之士,虽学术渊源不同,但从大的格局看,可分为三:宗程朱者、宗心学者和汉学宋学调和者。广西不少著述,如明全州人陈宣的《礼经意旨》、阳朔人唐瑄的《大学中庸直讲》和《诗经说意》、马平人周琦的《东溪日谈录》、陈邦偁的《太极图辨解》、吕景蒙的《定性发蒙》和《象郡学的》、李璧的《名儒录》、张所蕴的《图南会心编》、高翀的《四书会解》等,都是在宋明理学影响下产生的,有的理学著述如周琦的《东溪日谈录》、张翀的《浑然子》等,还被收入《四库》、《续四库》中。这些著述探讨了“天道”、“人心”、“心性”、“天人合一”等一系列重要理学命题,虽终究未能跳脱出程朱王学既有框架,但他们补充和完善了宋明理学,对全面理解宋明理学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理学的影响下,广西理学在学术上有四个特点:①维护道统,排斥异端;②重宋学而轻考据,重义理而轻文章;③重实用,轻理性探讨;④学理上因袭多于创获,重在纲常名理的阐述。

3. 宋明理学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理学的影响下,文人大都崇尚气格、砥砺名节;主张大一统,反对和镇压任何形式的叛乱,维持地方秩序;具有仁民、体恤民瘼的民本思

想。在民族文化形成和进化的过程中,在宋明理学渗透之前,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宗法制度、社会组织、乡村控制以及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原始色彩,经理学浸染后,呈现出信仰多元化、宗法系统化、地方救助组织化、乡约族规制度化、家庭伦理完善化等趋势。

（二）基本思路和方法

遵循宋明理学传播—理学影响—中华多民族一体文化格局形成这一内在逻辑,通过张栻、王阳明等著名理学人物个案分析和宋明理学人物的群体描述相结合,揭示理学传播的主体、途径、方式和传播性质等。并通过分析比较,剖析宋明理学在广西的发展历史及其特征,进而探索宋明理学在学术、士人气节和广西民族文化核心价值形成等方面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三）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本书创新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①第一次以广西的理学为视角,梳理相关文献,厘清了传播和接受主体、传播途径、方式及其特点、性质,第一次对广西理学发展进行了学术分期。②第一次把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理学的观照范畴,对它做融通性、整体性研究,彰显出宋明理学在广西民族性构建中的影响。

三 需要界定的几个问题

（一）起止时间

本课题研究,从宋到清其间七八百年的历史。虽然理学在清代仍然是正统思想,但因清代的理学大家大多为明遗民,而后理学家如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几乎剿袭陈说,少有新见。事实上,清康熙后,引领学术风潮的是朴学而不是理学,所以,传统把理学都称为“宋明理学”。但本书着力讨论的是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广西的理学经过宋元明长期的浸润,在清代才是成果期。因此,本书将清代的理学纳入讨论。

（二）理学和传统儒学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地位

宋明理学可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和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比较,理学的讨论范畴、理学家的旨趣和诸子百家大相径庭。先秦诸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特质,那么“理学”呢?

一些学者把理学的发端追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在于韩愈倡导道统

说法被北宋道学所继承和李翱《复性书》对“性善情邪”做出的解读。李翱的“性情”二元理论与孟子相比，他的突破在于“性情”与“善恶”相对的概念，孟子虽然谈述“理”、“气”、“心”、“性”诸范畴，但是这些概念是孤立的。而李翱则有一个清晰的二元论结构，“性善情邪”是他人性论的总纲。理学真正的奠基人物是周敦颐，他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这两部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乃至伦理学，上至宇宙洪荒，下至人伦日用，无所不包，系统性和思辨性色彩兼具。邵雍发明“元会运世”之说，给出了宇宙的时间和空间轮廓。张载“民胞物与”说标志着普世伦理的出现，二程更加明确提出了“天理”和“人性”之辨，思辨气息愈加浓厚，再加上后来的朱熹、王阳明等集前辈之大成，构成了“理学”一以贯之的脉络。

理学家都是儒家传统忠实的捍卫者，把儒家经典奉为主臬，为何他们不入经学家之列呢？清人的“汉学”和“宋学”之争针对的便是这个问题。汉代的马融、郑玄等人注经，或训诂文字，或考辨辞章，重视原文。宋代理学家们擅长以孔孟之说来论证“心体”、“性体”，有意识构建自己的学说，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他们基于经典来重构。另外，“理学”和“宋学”这对概念，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漆侠等人早已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宋明理学影响深远，貌似有宋一代都可为“理学”所涵盖，实则大不然，仅就理学家争论的“心性理气”框架之内而言，尚有陈亮、叶适的“事功派”，王安石的“孟子学”。

由于“理学”的范畴长久以来没有确定，故学者研究的角度具有多样性。由于近代学科的分隔，“理学”成为历史学、国学、哲学的共同关注。专门论著有侯外庐《宋明理学史》、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陈来《宋明理学》等，这些著作多是从哲学史的角度对理学家的学说进行解析。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为理学家刻画出了一副生动的面孔，对理学家所处的时代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明确的历史责任感，他们是具体场景中的政治人物，甚至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理学家除了在思想上开拓和多热衷于介入政治外，更关注他们的远景目标，政坛的失意或许为他们的教书育人拓展出更广阔的空间，他们广收门徒，化时代主张为历史期许，如孔子的“退而修诗书”，他们“化民育德”的学说很快受到了官方的重视，宋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颐、程颢、

程颐、张载、朱熹从祀孔子庙，理学的官学地位得以确定。进入元代，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官学，“以朱子之书为取士之规程，终元之世，莫之改易”^①。明代学术经历了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以及对王学的反思批判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太祖确立程朱正统地位，“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②。正如陈确所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③成祖更使儒臣将程朱理学家的著作辑成《性理大全》，颁布天下。明中叶，以阐发“良知”，强调主观精神为主要特征的阳明心学，猛烈地冲击了程朱理学，具有纠正程朱学支离破碎的弊端和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时间，王学受到许多士人信奉，大有压倒程朱之势。晚明要求重建道德和务实之风，主张由王返朱，塑造理学气节与道德人格。清初，理学都是影响最大的学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朱熹配享孔庙，又命理学大臣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诸书，说朱熹之学乃是“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④。在用人方面，重用熊赐履、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大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礼部根据雍正的意图，将宋代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元代赵复、金履祥、许谦；明代陈瀚、罗钦顺、蔡清；清代陆陇其从祀孔庙。乾嘉时期理学在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然下降，但仍竭力维持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鼓吹其所宣扬的纲常伦理，就是不愿提倡学理性的探讨。在晚清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仍回归于主流学说的位置。从宋至清七八百年以来，理学家思想的意义不仅于当代，而且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抛开历史场景，深入剖析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是很有必要的。

理学随着理学之士进入广西，借助余英时历史还原的方法，着重描

① 柯劭忞等撰：《新元史》卷227“儒林一”，民国9年天津退耕堂刻本，第3186页。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2“高攀龙传”，《四库全书》第4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③ 陈确：《乾初先生遗集》卷4“与黄太冲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5页。

④ 官修：《国朝官史》卷32“书籍十一”，《四库全书》第6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8页。

述、探讨理学之士在广西传播文化的历史是可行的。且理学有其明确的关怀，“尊德性”、“道问学”是理学的功夫与修养，平治天下才是理学家的终极关怀。故此，本书重点关注的是受过理学思想熏染的学者在广西传播“三纲六纪”的伦常观念，践行儒家“仁义忠信”的道德信条，形成移风易俗、化夷为夏的影响。

宋明理学的思想在广西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特质。首先，和理学家们的核心关怀一致，无论是讨论“天道”，还是“人欲”，落脚点都在维护纲常名教。广西在历史上，长时期游离于中原文化影响之外，理学思想在广西的传播，颇类似于孔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有教无类”，即开学术之风气，故此，理学之士在广西讲学，并不会遭遇许多来自儒家思想内部的理论交锋，而当地土著文化也无力在较高层次上对理学思想进行理论上的解读，故此，理学在广西传播担负的使命无外乎“化民育德”、“移风易俗”、“化夷为夏”等宗旨。其次，入桂理学之士面对当地的文化环境，虽有开荒拓土的艰辛，但开坛设场、讲授学业并不十分艰难，这是理学迅速传播的有利条件。再次，因为广西的本土人士在当时大多不甚开化，普通的读书育人的传统并未养成，如此说来，理学的各个派别之间的内部争论似乎很难得到土著居民的呼应，如“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性即理”与“心即理”之辩，其创见也就乏善可陈。所以，理学在广西的传播过程中，基于理论本身的派系林立并不突出，理学演变为一种文化上的启蒙运动，这是广西理学传播中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一个特点。最后，理学家过于关注个人的心性养成和纯粹的理论辨析，往往缺乏对实功实效的关注，当然，绝不是他们缺乏天下国家的历史使命感，作为士大夫的成员，“平治天下”是他们人生价值的重要评判，不过，因为“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这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并非可以轻松驾驭，而且儒家所关注的大本大源的问题是对君王德行的养成，“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所以，他们忽视具体的生产实践也就在所难免。范仲淹说过：“儒者自有名教，何必治兵。”甚至保家卫国相对于培养孝子贤孙的事业都不是什么大事，两宋盛而不强，军事上节节失利也就不难理解了。入桂的理学之士却不同于此等气象，因为广西相对中原地区，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差异，生产生活的技术水平也是相对十分落后的，理学之士一方面通过大力兴办教育、发布文稿等途径和方式，输入礼教观念；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使当地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这一层

面上讲，入桂的理学之士融合了“事功派”与“学程派”的分歧，促进了理学各种内部差异在广西当代文化的融合。

（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

（1）本书所说的“文化”，指的是汉文化系统的文化，以此为标准，来评析广西的文化程度。由于在宋元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几乎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少数民族与汉族文人截然分开，因此，就不分民族，把文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融通性观照。

（2）本书虽把12个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除壮族外，其他民族士人与理学的关系的记载缺乏，故文献可能更多显示的是壮族。“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宋元明清以来土司统治地区为考察对象。

（3）少数民族文献，指的是用汉字书写的少数民族文献，包括碑刻和民间道公经师等文献。

（4）所谓理学之士，指的是学术著述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和《闽中理学渊源考》等传统理学著述，有明确记载之人；或虽没明确师承，但其相关著述中，明确表示崇尚理学者。入桂理学之士包括在广西官宦和因各种原因羁留广西的理学之士。本土理学之士指的是《广西通志》、粤西三载等传统典籍所确认籍贯之人，且学术渊源有自或明确表明崇尚理学者。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缘起和选题的意义	(1)
二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2)
三 需要界定的几个问题	(4)
第一章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和接受	(1)
第一节 宋明理学在宋代广西的传播和接受	(7)
一 宋明理学在宋代广西的传播	(8)
二 宋代本土士人对理学的接受	(66)
第二节 宋明理学在元代广西的传播及其接受	(76)
第三节 宋明理学在明代广西的传播及其接受	(80)
一 黄佐在广西的理学传播	(101)
二 王氏心学在广西的传播及其接受	(106)
三 湛若水在广西的活动及其学说在广西的接受	(120)
四 周琦、蒋冕的理学接受及其思想	(128)
第四节 宋明理学在清代广西的传播及其接受	(155)
一 唐鉴、谢启昆、马丕瑶等人在广西的理学传播 及其影响	(165)
二 清代广西的理学接受及其广西学术的成立	(177)
第二章 传播的性质及其特点	(266)
第一节 传播的官方性	(266)
一 广西的学校及其理学教育	(266)
二 广西的科举及其科举的理学化	(286)

第二节 传播的主动性和单向性	(291)
第三节 传播的差异性	(293)
一 宋明理学传播与文化区域的差异性	(293)
二 宋明理学的接受对象的差异性分析	(297)
三 宋明理学传播的民族性差异	(299)
第四节 传播的通俗性	(301)
一 理学传播以基本概念为主	(301)
二 理学传播以人伦教化为核心	(305)
三 强调事功	(308)
四 广西理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309)
 第三章 宋明理学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文化	(322)
第一节 宋明理学与广西少数民族士人群体	(322)
第二节 宋明理学影响下的士人的人格气质	(337)
第三节 捣毁淫祠与正统思想的推行	(347)
一 淫祠淫祀及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淫祠淫祀	(347)
二 捣毁淫祠, 禁绝淫祀	(353)
三 建立正祠, 推行正统思想	(356)
第四节 宋明理学与明清时期少数民族的宗族制度	(371)
一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的宗族制概说	(371)
二 《朱子家礼》与广西的宗法制	(388)
第五节 宋明理学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治	(406)
一 乡约与理学的关系及其官方化过程	(407)
二 保甲介入少数民族的民间基层组织	(414)
三 社仓等政府救济形式的推行与影响	(418)
第六节 宋明理学影响下的广西少数民族习俗嬗变	(423)
 结 论	(437)
 主要参考文献	(448)

第一章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和接受

广西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据史书所载，远在周，“苍梧”、“南夷”、“南国”、“南海之珠”等记载时见于中原文献；而兴安、武鸣、宾阳、忻城、荔浦、陆川、平乐、恭城、田东、横县等地都先后出土过大量殷周青铜器。公元前 214 年，秦统一岭南，开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粤西地区直接在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下，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

两千多年以来，儒学是中原华夏文化的主体，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儒学对当时广西社会的影响，袁袞在《贺县学记》一文中就有精彩表述：“孔子之道，天下万世所共仰者。师而事之，可以修政，可以立事，可以化民而成俗。故中州遐壤，岭海内外，莫不惟孔子之道是尊。”^①

在儒学传入岭南地区的历史过程中，南越王赵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在位 67 年，以“和集百越”、“南北交欢”的立国原则，大力宣扬儒家的诗、书、礼、乐，这在粤西地区播下了儒学的种子。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针对迥异于中原的交趾所属文化，通过杂居形式，逐渐改变百越民族的习俗，如《后汉书》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着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② 此时中原文化是一种自由的、单向性的影响，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传播。

① 袁袞：《贺县学记》，载汪森编，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卷 27，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7 页。

② 范曄：《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百衲本影宋绍熙刻本，第 1158 页。

与西汉相比,东汉儒学更盛。东汉时期,在广西传播儒学的著名人物有锡光、任诞、谷永等人。锡光和任诞都是硕学鸿儒,任诞尤精于《诗》、《易》、《春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诞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①谷永,也是一位经学家,精通京氏《易》,汉灵帝时担任郁林太守,他曾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并且教以冠带礼仪,化民成俗。所以史书称赞:“岭南华风,始于守焉。”^②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刘熙、程秉、薛综、虞翻、陆绩、颜延之等人在此传播儒学,推行礼教。

刘熙(160—?),或称刘熹,字成国,北海(今山东昌乐)人,官至南安太守。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据陈寿《三国志》说,吴人程秉、薛综,蜀人许慈都曾从熙问学,著有《释名》和《孟子注》。《释名》仿照《尔雅》,以声求义来阐释事物名称,对后代训诂学和语源学影响较大,而《孟子注》已不传。建安中,荐辟不就。避地交州,往来苍梧、南海、容间,授生徒数百人。曾担任交州长史的程秉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

程秉,生卒年不详,字德枢,南顿(河南项城西)人,官至吴太子太傅。郑玄弟子,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世典州郡为著姓,综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后为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整顿风俗,绳以礼法,婚俗为之一变。

虞翻(164—233),字仲翔,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日南太守虞歆之子。曾为会稽太守王朗功曹,后从孙策,仕于吴,官至骑都尉。他于经学颇有造诣,尤精《易》,著有《老子》、《论语》和《国语》等。为人狂妄、疏直,陈寿评价说:“虞翻古之狂直,固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③流放交州期间,“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④。

陆绩(187—219),字公纪,吴县(今苏州)人,汉末庐江太守陆康

① 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百衲本影宋绍熙刻本,第1158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76,《南蛮西南夷列传》,百衲本影宋绍熙刻本,第1005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57“吴书第十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41页。

④ 同上书,第1321页。

之子，曾官奏曹掾、郁林太守。作《浑天图》，注《易经》，撰有《太玄经注》。陆绩少年时，就曾语惊四座：“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① 知礼节，懂孝悌，陆绩怀橘更传为佳话，元代郭居敬将其编入《二十四孝》。为官清廉耿直，为人所忌惮，被贬出为郁林太守。陆绩关心民瘼，做了这样几件民心工程：①筑城墙，抵御布山县南部流寇和土匪骚扰。此墙在清光绪时还可见，高约三尺，长一里许。②凿井，解决了田亩灌溉和人畜饮水难的问题，今贵港市尚留有当年陆绩挖出的一口大水井，人称“陆公井”。③广施教化，建学宫（旧址即今天的南江小学），并亲自上课，“郡人初未知学，绩以诗书造士，从者云集”^②。陆绩之后，此地儒学之风甚盛，故《广西通志》有“陆绩之儒播于浔”之说。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曾任主簿、太子舍人、始安太守、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秘书监、光禄勋、光禄大夫等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后世称“颜光禄”，谥曰宪子。少孤贫，好书博学，儒学深厚，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其诗辞藻华丽、用典繁密，汤惠休说“如错彩镂金”，钟嵘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明代张溥辑有《颜光禄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颜延之景平元年被贬为始安太守，一则因为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波及。当时傅亮、徐羨之、谢晦等有废刘义符而立刘义隆的意图，于是排除异己，颜延之既深受皇帝亲信，又与帝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刘义真交好，因此他被逐出为始安太守，故《宋书》本传说“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二则也因为恃才傲物，引起了傅亮的嫉妒，《宋书》本记载：“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③ 颜延之在桂林期间，常到独秀峰下岩洞读书，现有“读书岩”遗址。虽然他留在桂林的诗文仅有《寒蝉赋》、《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

① 陈寿：《三国志》卷57“吴书第十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28页。

② （明）陆应阳：《广舆记》卷2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3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46页。

③ （梁）沈约：《宋书》卷73，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92页。